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沙洲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编选例言

(一)本选辑刊印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地方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希望全县耆老及各界人士源源赐稿。

(二)本选辑所刊资料，是当事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是历史的记载。本刊根据来稿需要，作些调查、研究和考证工作。从第一辑开始，待积有相当数量的资料，即出一集，不作定期出版。

(三)本选辑所刊资料，包括从戊戌变法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工商、民族、文教、科技、城乡掌故、社会和侨务等各方面历史资料。有关文物、遗作、日记、函电、书信、手稿等有一定参考价值者均可入选。来稿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论形式，不求完整。

(四)本选辑所刊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只在内部发行，以供史学工作者的参考。

(五)本选辑对所有来稿，酌情加以选择、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六)欢迎读者对所刊提出批评，指正。

目 录

- 回忆沙洲地区的革命斗争 成国粹 (1)
忆我在沙洲的一年 (1940—1941) 张臣栋 (15)
记新苗乡人民的反清乡斗争 孙涤尘 (26)
沙洲县政府成立回忆录 (1941) 沈志怡 (28)
欢迎十二圩港反正伪军全体官兵 林俊 (31)
孙逊群烈士介绍
 我的父亲孙逊群 孙绍基 (33)
 忆孙逊群烈士 殷铁铭 (35)
 孙逊群智斗同善社 王恩洽 (38)
我的革命简史 庞露 (40)
刘海沙过去的隶属问题 曹仲道 (42)
南通纺织大学沿革概况 虞卜磐 (49)
沦陷初期杨舍周围的十八路番王 郭圣与 (59)
杨舍商团创办史略 焦士谬 (68)
后塍当铺史 马伯高 (78)
旧社会经营花粮行的一套生意经 叶林培 (84)
解放前，后塍镇之烟、赌、娼 季诵华 (90)

- 在宪兵部队十年 徐均宾 (92)
- 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二十八期 徐均宾 (111)
- 日寇的“三光政策”在沙洲
 鬼子洗劫后塍 摘自1941年东进报 (114)
- 日寇蹂躏港口 潘公航 (115)
- 塘桥“牛尾巴湾”惨案 徐炳才 (119)
- 沙洲县梁丰中学简史 童吏章 黄守成 花绍宗 (121)
- 沙洲基督教简史 钟时计 (132)
- 古黄泗浦春晓 奚才保 张振华 (136)
- 十一圩港史话 张志文 (138)
- 东吴遗迹章卿寺 徐振旗 (142)
- 鹿苑钱氏之由来 钱元凯 (143)
- 三兴镇、三省镇、新兴镇 张志文 (145)
- 更夫 张振华 (146)
- 后塍之得名 蔡邦年 (150)

回忆沙洲地区的革命斗争

· 成国粹 ·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日寇占领南京，国军节节溃退，沪宁线全部被日寇控制，他们到处烧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后塍、东莱一带就被鬼子杀死过不少无辜的老百姓。日寇的暴行，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民族仇恨，也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热情，中国人民决不愿做亡国奴。这是一个混乱时期，沉渣泛起。一方面有人做狗腿子，为虎作伥，向日寇献媚。也有些“乱世英雄”，他们不满或反对日寇暴行，也许不愿做亡国奴，但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拉起队伍，独霸一方。当时沙洲地区就有李善生、耿士廉、曹培福、费良琪、秦祖林等。他们兴起来后，你打我，我打你，都想“吃掉”对方，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愿当亡国奴，积极要求抗日。但是缺乏领导，一盘散沙，不能形成势力。

这时，国民党部队向武汉撤退。皖南、茅山地区地理条件好，国民党顾祝同、冷欣（第三战区）在这里留下了十来万人，组织了忠义救国军，收买地主武装和“乱世英雄”。当时“乱世英雄”发展的结果，一部分收编为忠救军，被国民党控制去了。如包汉生、包福生、耿士廉等，就是国民党培养的，专门和我们对抗。也有一部分给共产党教育争取过来了。如李善生，在后塍北、猛将堂一带是他的势力范围。党组织派陈刚到李善生那里去做工作。就把他部队拉到苏

北去。到苏北之后，李善生吃不來苦，开小差回來了。

一九三八年初夏，新四军第一次东进，跟忠救军打了几仗，一直打到上海虹桥飞机场。忠救军就告状到顾祝同那里，顾祝同又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说我们不听命令，要我们撤回。当时项英右倾，命令部队撤回。撤回时留下了三十六个伤员养伤。伤病员就和群众一起组织小型武装抗日。以后，就以他们为骨干，组织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这时，上海地下党派来了一部分同志，决定开辟根据地，组织发动群众抗日。

一九四〇年春，“江抗”向沙洲、常熟、江阴、锡北等地发展。春夏之交，“江抗”到沙洲，建立办事处，由杨明德、蔡悲鸿等负责。民运工作队不少是上海来的。这时候，沙洲的地方游击队不多了。“民抗”、“江抗”一出来，“忠救军”往山里跑了。留下小股的活动，不敢和我们正面交战。鬼子的主要力量向武汉进军，除主要城镇有据点外（杨舍有鬼子），整个农村是空虚的，苏南大部被我们控制。

一九四〇十月，我正式参加革命工作。那时，“青抗”、“妇抗”、“农抗”、“工抗”、“儿抗”等抗日群众团体和自卫队基本上组织起来了。我们在老海坝与陆宝娟、尉迟凤鸣、张莺等同志一起搞“二五”减租，在那里宣传政策，动员教育，还斗了几个地主。但群众对“二五”减租有些顾虑，怕减了租没有田种，怕我们走了有反复。但是我们也从中发现培养了不少积极分子。

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起到四一年“清乡”，区、乡政权逐步建立，全县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沙洲县政府成立大会在大新以东、北中心河以南的一个曹姓地主庄园召开，由各乡、镇代表、工作同志、县大队人员、地方绅士等二、三百

人参加，我也去参加的。杨明德同志主持大会，上午开会，在那里吃顿中饭。当时，从鹿苑、东莱向北，合兴向西都发动起来了。年旺街向西，后塍向北是我们的天下，基本上没有别的部队，即使有也站不住脚的。合兴以东还没有开辟起来，合兴那里主要有耿士廉“暗杀党”。当时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有：周庄十七大队李福全、杨舍芦松英、后塍李禹仁、季小根、施明德、施明芳、徐永清，大新肖国衡，后塍还有铁木工会主席叫顾金才。那时，我们还组织店员反对资本家剥削，教育资本家不能随便打骂职工、开除职工或延长工时，要改善职工生活。

一九四一年三月到六月，我到路东特委党训班学习。七月，清乡开始，我学习回来，县委就派我到沿江区隐蔽下来，担任地下党负责人。当时，形势比较紧张，八月份竹篱笆打起来了，鬼子建立了很多据点。他们动用十万鬼子、几十万伪军实行拉网战术，集中兵力，村村巷巷到处搜索，十几步路就有一个鬼子。把老百姓赶在一起拷打查问，晚上每个路口都站岗放哨。我住在一户农民家里，活动很困难。到八、九月份，部队开始撤走了。我们的任务是找船、找向导，帮助部队北撤，到十月份，长江里的船全部被封锁。

沙洲县委、县政府在四一年八月就开始北撤。北撤后，于九月份李健生等同志带一个团的兵力又回来反清乡，鬼子就集中兵力围歼，损失较大，先在后塍突围，一仗就牺牲了不少同志。当时正在发大水，在徐家高桥渡河时，不少人不会游泳，再加慌张，过河时死了不少，没有死的冲散了。突围出来的部队在江阴西乡又和鬼子打，部队基本上被打垮了。包厚昌部队从沪漕港过江，损失不大，但如果迟一天走，长江封锁，就走不掉了。还有个连是个主力部队，包厚昌叫我去

找，在后塍北面找到了。但护漕港已封锁不能走，我们打算从后塍转到周庄，再到江阴西边过江。但到周庄，公路上不能走，我们只好把武器集中收藏，部队宣布解散，我带了三个部队干部回沙洲，回来听说焦康寿也北撤了，他是化装为农民背了拾棉花筐混过去的。我们四个人到二圩岸，躲在一家老百姓牛棚上的草窝里，躲了三天。地下党帮我打听到有贩鸡船到苏北新港去，我们就乘了鸡贩子船，从拦门沙盘头上过江到新港，新港是鬼子的据点。我们到那里天已亮，这天正好我新四军把新港的鬼子据点消灭，部队还没有撤，我们一上岸，就向东北方向走，到了单王港找到了江南办事处。

一九四二年一月，“清乡”结束。自卫队和积极分子都躲掉了，未露面的隐蔽下来了。民主政权、群众组织都摧垮了。我方没有投敌的，少数同志被迫自首，做了个保结。只有个别地痞流氓、伪职人员中有投靠鬼子的，所以地下党组织没有受到破坏，保存下来了。基本群众是很好的，尽管受到极大摧残，但还是支持抗日，支持新四军的。这些都为以后开展工作提供了条件。

一九四二年初，焦康寿从苏北又回到沙洲，在中兴王德成那里学做风水先生，又当过教师和“香火”，总之以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何洛北撤后也很快回到沙洲，到常家埭岳父家去结婚，在那里当教师，坚持地下斗争。李桐明在清乡前没有暴露，仍在学校教书。后来，面目暴露了，就转入地下隐蔽起来。赵惕义原来是村干部，面目不大红，隐蔽在太字圩港种田。俞静德北撤后在靖江活动。我军主力部队在高邮一带活动。这段时间，日寇发了一阵狂走了，国民党“忠救军”和伪军猖狂得很，建立了保甲制，地痞流氓活动猖獗，老百姓随便被捕杀害，斗争很残酷。我

们只能以很隐蔽的方式坚持地下斗争。

一九四三年冬，日寇对国民党从诱降到进攻，占领武汉以后，妄想进攻四川，灭亡中国。鬼子兵力集中在前方，后方空虚了。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农村搞得乌烟瘴气，不得人心。群众都希望共产党赶快打回来。根据这个有利条件，上级决定进一步恢复苏南根据地，发展解放区。记得四三年年底，我在苏北“江、高、宝”地区整风队学习，包厚昌到苏中区党委开会，指名要我和沙金回沙洲。包还调了两个连共200多人和我们一起南下，包厚昌、沙金一起先到靖江单王港开了十多天会。参加的有余静德、何洛、李桐明、张永明、赵惕义等。当时沙洲县委成员有：沙金（县委书记）、焦康寿（副书记）、陆顺生（县委委员）、孙刚（委员）。会议结束，就回沙洲。

我到沙洲后，先隐蔽在拦门沙姓俞的木匠家里，跟他学手艺。住下来约两个来月，觉得不行，以木匠职业为掩护，活动受限制。于是，我就带了十几个人到老海坝海沙区。那时沙金部队一个特务连，还有余静德的县大队，何洛担任指导员，还派去一个刘大队副。李桐明在海沙区一直不暴露面目，搞秘密党工作。

一九四四年四、五月份，组织上派我到海沙区，正式成立区武工队，调配给我七、八个人。海沙区在清乡前有几个老关系，如王锡民、肖国衡等。通过他们发展新关系。这时避难出去的同志也回来了，群众对我们是欢迎的。国民党顽固派摸不准我们情况，不敢来沿江一带。自卫队秦祖林、秦祖洪依仗日寇势力，活动在年旺街以南。“忠救军”费良琪控制在善政桥以南。国民党顽固派在那里建立第三区，“背包”区长龚赋。善政桥南、合兴等地是他们控制的。

一九四四年八、九月份，沙金想把局面打开一点，到香山那边去抄了一次费良琪的老巢，抓了些土匪，杀了几个，给敌人一点威胁。十月份，我们又到南新街阴沙埭、周家桥南面去抄龚赋的老巢，抓了几个，但没有把主要力量打垮。这样一来，县大队声势大了，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了，活动地盘也扩大了。费良琪到十字圩港来报复性打我们，被我们打跑了。原来因为形势紧张，县大队常在苏南、苏北之间穿插活动。后来形势好转，县大队在苏南活动的时间就长了。

一九四五年五、六月份，费良琪部队与黑警察勾结，被我们包围打垮了，打死几个，也抓了几个，还缴了一部分枪。这一段时间，我们在群众中宣传抗日必胜，鬼子必败，鼓舞抗日斗志。同时发动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开展抗租抗丁斗争。我们没有建立政权，主要利用伪政权为我们办事。当时一些伪乡政府人员惶惶不安，都想找出路。对他们中间能够争取的就尽量争取。要他们脱离伪政权，不要出卖良心，过去错了，不要再错下去。经过几次教育，他们就老实多了。对顽固的采取杀鸡儆猴的办法，在新海坝年旺街那里镇压了几个坏人。这里的群众觉悟较高，坏人不大敢动。总之，我们的斗争策略是能争取的尽量争取，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国民党先知道，他们抢先占领了杨舍、后塍等地。七、八天后我们才知道，到区、乡政府缴到一些枪。抗战胜利，我们成立县政府，沙金兼任县长。八月下旬，我们出动了一百多人去打后塍。当时后塍那里日寇已撤，只有“忠救军”费良琪部队，约四、五百人，还有曹培福约二、三十人。我们在晚上第一次把后塍打下占领后，白天敌军又反扑过来，我们又打了个回合，重新占领

了后塍。当时何洛同志负责侦察，差一点被敌人打死。四五年九月，宣布建立后塍市，市长刘一，我是后塍联防队队长（相当于区大队）。在九、十月份，各区普遍建立了政权。海沙区区委书记李桐明，沿江区区长陈佩璋，何洛与张永明一起去东沙区建立政权。我们开始利用原有乡政权征收公粮，收了一批公粮运到苏北，但数量不多。“双十协定”之后，开始准备北撤，我浙东部队奉命北撤，国民党军队却在后面盯梢，盯了两天，我方部队在南丰镇驻扎下来，给他们以突然反击，俘虏了不少官兵，教育一下就释放了。

按照“协定”，我们留守一个排的兵力。留守部队由于思想麻痹，想采用以前对付伪军的办法写信去恐吓他们一下，信送去了，敌人却假意同我们联系谈判，实际要“吃掉”我们，结果我们一个排全部被敌人包围，陆英和邵荣祖被捕。在十一、十二月份开始北撤时，各区大队都负责征粮，我们后塍区联防队负责，组织船队送粮到江北。征粮结束，区大队都撤走了。我们走时关照地下党同志，我们还会回来的，所以群众也不惊慌。这次北撤，是有准备，有秩序的北撤，没啥损失，我们到苏北后就集中到如皋城。

那时候，我们的武工队既搞武装，又做群众工作。除了打仗，还搞宣传、侦察、抓坏人，流动性很大。到四五年十一月北撤时，全县武工队员已有二、三百人，都是脱产的，供给制。一个区就有二、三十人。武器上面发一点，主要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如打龚赋伪区长就缴到几支新式枪。

一九四六年一月中下旬，春节前，组织上派我一个人又回沙洲。我记得那次过江到沙洲是在十一圩港上岸的，我扮做生意人，挑了一担香烟、肥皂等东西，枪放在肥皂箱里。陈有光妻子为了掩护我，和我同路回沙洲，她挑了担子在前

面走，我走在后面，碰到敌伪军就塞点钱和香烟，因此没有出什么事情。我到沙洲，就先到东沙、杨舍、后塍、周庄等地恢复关系，立脚点就在东界港。护漕港一带不能去，由赵惕义去联系的，东界港有茅千里、茅千山、茅千驹兄弟三个，老大茅千山是围田的土工程师，经济属中农，茅千里是可靠的群众关系。乐余镇东面有个季万青，是陈有光发展的党员。东港有个药店老板刘××是上层积极分子。我在茅千里、茅千驹、季万青家住了好几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到杨舍去联系许培林、钱惠安，还有一个蔡××。蔡不敢工作，以后就不再去找他了。后来，我又到后塍去联系施明德、施明芳、汪照明，他们是一个支部，施明德还交出保存的一枝枪和手榴弹。新苗头有李禹仁，徐永清在套南。店岸那里也是我去联系的。我和他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首先做点思想政治工作，稳定大家情绪，向他们宣传形势，传达上级指示。要大家准备长期隐蔽，采取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办法，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当时老百姓有正统观念，对国民党反动派本质不认识，抱有幻想。因此，在党内首先要提高觉悟，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同时，要随时注意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国民党反动腐朽的本质，以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联系，工作又逐步恢复起来，有些原来参加区大队的人员也愿意跟我们干，如沈凤仪、陈德章等，加上一些地下党员，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沙洲的关系接上后，我又回到苏北，向地委书记任天石同志汇报。在那里过了春节，任天石同志叫我赶紧回去，积极准备再安排几个同志去开辟工作。我再回到沙洲，青草沙那里正在围田，挑泥围田的大部分是贫雇农。我就通过茅千山介绍，到青草沙挑泥场当职员。不久，

组织上派来了钱仁忠同志，我就安排他到挑泥场去开酒店。那时，组织上给我们十几担米做本钱，租了间房子，借了些台凳，开设了酒店。当时我改名为郑三友，钱也以我兄弟名义改了名。当时有许多挑泥的农民和职工经常到酒店里来，边吃酒边谈论，我们注意观察，从中了解了不少情况，也发现了一些思想较进步的积极分子。象耿留弟、魏家声、沈汉堂等人比较积极，敢于斗争，后来他们都加入了共产党。地主的工资不能及时发，还要克扣，我们就因势利导，启发教育大家起来闹了几次风潮。我们在这里大约六、七个月时间，到九、十月份，敌人怀疑有新四军活动，但吃不准目标。后来，他们开始注意到酒店，我们就关店撤离。之后，我们就正式用新四军名义开展武装活动。

我们在敌占区开展工作，除了学会用武装保卫自己的安全以外，还要随身带有“良民证”、身份证件。特别是以合法面目进行活动时，如出入于敌人岗哨、关卡，或遇到突然其来的搜索、查户口等情况，如果没有“良民证”，就会遭到各种麻烦与危险。怎么办？通过各种关系去搞“良民证”。但是困难很多，不能及时满足工作需要。我在四六年曾千方百计试验制造一种假良民证，这个假证，又要经得起敌人的检验，辨不出是假，才能保证安全。由于我制的“良民证”，是利用敌人的空白“良民证”贴上各人的照片，每个人自己填好职业、年龄、住址等，交给我后帮助他们刻上江阴县或无锡县的硬印。当时要刻一个真硬印是不可能的。我就用硬木刻一个假硬印（文字是凹形）。用橡皮垫着后再用锤敲打就成一张“良民证”。我先后为二十多位同志做了假良民证，方便了合法活动。

一九四六年三、四月份，领导上派陆留保同志来了，我

布置他到乐余镇，通过季小根的关系，认了一个摆货摊的孤老太为寄娘。陆留保就住在她家里，以挑货郎担为掩护到处跑。我们先不要求他开展什么活动，只要先扎下根来。下半年，组织上又派来了仲国鳌同志。我们叫徐永清在后塍高吴庄给仲国鳌安排当小学教师。他教了半年书，就到金谷落里去，与马品佳接上关系，仲国鳌在那里开了个诊所，以医生为掩护，开展上层活动，单线跟上面联系。

一九四六年我到苏北去跑了两次，就确定钱惠安当交通员。为了熟悉路线，我领着钱惠安第一次去苏北，这次从十一圩港到苏北小李港，正好国民党区政府在那里活动，当我们正面碰到国民党伪军，准备脱衣过港时，被敌人发现了。他们把我们抓起来进行审问，我们都说是贩大猪做生意的。他们问来问去，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把我们关起来。幸亏我们身边带了不少钱，就塞点钱给看守兵，关了一个多星期，国民党区政府要我们找“保”才能释放，我说，这里没熟人，找保要写信到江南才行。这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白蒲，他们急于出发去白蒲，只得把我们放了。这次到苏北没有接上关系就回江南。

一九四七年清明节前后，我们得到消息，敌人要大举进攻苏北，苏南的同志都要回到江南来。上级通知我到锡南去接何洛同志，他在那里以卖布为掩护。我们去无锡南门找到何洛同志后，俩人坐轮船到杨舍上岸，然后向北走到常家埭。一个月后，李桐明、张永明、朱凡等都来了。我们在肖国衡家开会，决定建立武工队，开展武装活动。当时朱凡是澄锡虞工委委员，他作为上级代表来到沙洲。何洛是特派员，我是副特派员。太字圩港一带没有武工队去活动，只有秘密党，由赵惕义负责，那里群众基础好，比较放心。这时，

钱仁忠、陆留保等也集中起来了。到夏天，我们正式转入武工活动，先以扬舍吼山房作立脚点，然后逐步向西边发展。我和李阿荣、季万清、顾雪琪等到周庄一带活动，开始只有五、六个人。周庄南面有人武工组，组长宋天荣，他在四八年牺牲了。他的活动地区就交给我，以后我们又向云亭一带发展。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进攻苏北，我党经济处于困难阶段，上级党要求我们自力更生解决经济问题。当年八、九月份，我们得知后塍大地主吴元琴从常阴沙收租回来，就组织了一些武工队员到吴元琴家去，把吴从房里拖出来打了一顿，弄到了几万块钱。九、十月份，无锡纱厂资本家到东莱、南丰一带来收棉花，他们人住在东莱，每天早晨把钞票送到南丰镇去。一次，我们组织了朱林官、张金保等人化装成农民，拿了扁担落绳候在一号桥那里。他们送钱的三辆自行车迎面过来了，二辆车在前，一辆车在后，距离一百公尺左右。等前面二辆车到我们面前，就突然冲上去把他们的车子一推，人跌下来，枪夺过来，我们就弄到了两麻袋钞票。后面一辆车上的人看见出了事，就立即向后转，去报告自卫队。一会儿，自卫队追来了，我们把钞票藏在苋菜堆里，分散跑了。由朱林官掩护，一边打，一边跑，敌人盯住朱林官猛追，跑到南丰镇南面，朱实在跑不动了，就往河里一跳，头上盖了水草，只露出两个鼻孔透气。敌人追来。对河里打了一阵枪，没有打到人，也没有找到人，在河边等了一阵，回去吃中饭了。这时朱林官才从河里钻出来，场上的一个妇女正在打黄豆，她认识朱林官，看到敌人又来了，就把他堆在黄豆秸里藏起来。吃过饭敌人又来了。他们从家里找到河里，但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到晚上，朱林官才逃出

来，连夜赶到杨舍。这时，我们已到杨舍，再派人到苋菜桥去把钞票拿回来。

也是这一年八、九月份，东界港农民银行发放贷款，有一笔现钱。我们先派茅千里侦察，我们几人隐蔽在他家里（我、何洛、季万清等）。二、三天后，贷款钱来了，我们在晚上化装成国民党游兵，穿了国民党兵的衣服敲门进去，把一个负责人揪出来，声称向他借路费，搞到了一部分钱，还有一部分早给他们转移了。等我们一走，他们去自卫队报告，陈德章在自卫队里，他故意拖延时间，所以等自卫队到，我们早已走远了。

一九四八年，我们就直接向资本家、地主、富农公开募捐爱国税、爱国粮，指名道姓要多少钱、粮、洋纱，限期要伪乡、保长完成。他们都乖乖地交了。如周庄恶霸地主缪伦千，我们要他五十包洋纱，他也只好乖乖地交出来。这样就解决了经济困难。

一九四八年四、五月份，葛桂荣主动来找我们，约定在常家埭朱友生同志家里接触。葛是开小差来的，他却吹牛说是包司令派来的，吹嘘有什么枪，多少枪，实际上他已向国民党投降叛变，想来探听消息。到七月，晨阳区伪区长陈维翰接到伪县长密令，要他配合葛桂荣行动。我们就叫陈再进一步了解，了解到葛想打进我们内部，妄图乘我们开会时一网打尽。我们就将计就计，将葛桂荣引来抓住，吃过晚饭，就派了五、六个武工队员把他用绳勒死，挖坑深埋，毁尸灭迹。之后，联络点的朱友生同志被国民党抓去，拷打和关进牢房。

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苏南地区变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的武工小组越来越多，局面慢慢打开了。

一九四八年夏天，邵崇祖释放后在周庄西边小学教书。我打听到了就去与他联系，他很高兴，愿意出来继续干革命，我就叫他开展这一带工作。王国良也来参加了，和花洪保等建立了一个武工小组。杨民奇已从澄西回到沙洲，和东莱的徐小迷一起负责东莱、鹿苑、塘桥一带开辟工作；孙德贤、陈培荣在店岸一带。何洛负责杨舍周围，有时也到南丰、南兴镇一带。这时沙洲的抗丁抗粮斗争开展得比较普遍，群众组织起来放哨抗丁。一次，七、八个小青年扛了扁担集中住宿躲壮丁，走到一条河边，正巧碰到自卫队，自卫队的人看到河里有人影子，真如惊弓之鸟，以为是什么部队来了，吓得逃回杨舍去了。还有一次，在南新街那里，一个伪保长领了三个自卫队员正在抓壮丁，何洛、朱林官在那里碰到了，被我们打死二人，二人逃走，以后他们再也不敢随便出来抓壮丁了。壮丁懂得紧，我们就叫伪乡、保长买些地痞流氓去当兵，由富户出钱。这些地痞流氓到部队不几天就逃回来了。抗粮抗租主要采取拖、赖、申清减免的办法。那时广大群众已看透了国民党不是好东西，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四八年年底，苏南人民都知道新四军就要打过来了。一些国民党官兵也动摇了，群众迫切要求新四军早点来，跟我们革命跑的越来越多，我们到村子里可以公开召集开会了。老百姓主动靠拢我们，走到那里就问新四军什么时候来。原来我们白天躲着不出来，后来老百姓叫我们放心出来。我们到处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罪行。镇压了几个伪、乡保长中的少数顽固派。如后塍伪保长徐××干了不少坏事，不仅威吓老百姓，还要监视我们行动，被我们杀了。能争取的伪乡、保长，我们写信去教育他，要他主动来联系。有的伪乡、保长不敢来，请人带来口